

中国史前陶面具的演进及其与巫雉文化关系的再认识

张卉

摘要:【目的】研究旨在揭示史前北福地陶面具和半山类型彩陶上陶面具的起源、功能演变及其与巫雉文化的内在联系。【方法】结合文献考证与考古实物分析比较、纹饰解读及巫雉仪式释读,揭示面具的形制、功能与文化象征。【结果】北福地陶面具为迄今最早实物,用于祭祀、驱疫等巫雉活动,体现祖先与图腾崇拜。半山类型彩陶器盖首次发现人戴面具形象,反映图腾文面习俗与神人通灵观念。【结论】北福地与半山陶面具共同构建了史前至青铜时代面具发展的关键链条为后世青铜面具及雉仪传统奠定基础。

关键词: 史前; 陶面具; 巫雉文化; 北福地陶面具; 半山类型陶面具

引用本文格式 张卉. 中国史前陶面具的演进及其与巫雉文化关系的再认识 [J]. 创意设计源, 2025(6):36-40.

Revisit to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Prehistoric Pottery Mask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Witchcraft Culture

ZHANG Hui

Abstract: [Purpos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origins, functional evolution, and intrinsic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prehistoric pottery masks from Beifudi and the painted pottery of the Banshan type with witchcraft culture. [Method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rchaeological artifacts, interpretation of decorative patterns, and analysis of witchcraft rituals, the form, function, and cultural symbolism of the masks were examined. [Results] The Beifudi pottery masks represent the earliest physical evidence discovered to date, used in witchcraft activities such as rituals and epidemic exorcism, reflecting ancestor and totem worship. The painted pottery vessel lids of the Banshan type feature the first discovered depiction of a human wearing a mask, illustrating the practice of totemic facial markings and the concept of divine-human communication. [Conclusion] The pottery masks from Beifudi and Banshan together form a key developmental chain in the evolution of masks from the prehistoric to the Bronze Age,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later bronze masks and the witchcraft culture.

Key words: prehistoric; pottery mask; witchcraft culture; Beifudi pottery mask; Banshan type pottery mask

引言

面具艺术可追溯至史前,其通常采用陶、木、金属、布、皮、壳等材料制作,起到遮挡面部的作用。中国古代对面具的称谓较多,有假面、大面、代面等。在民间,面具亦俗称为“鬼脸”“脸壳”或“脸子”。

关于中国面具的起源研究,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国面具的起源与原始狩猎活动、图腾崇拜、原始宗教及巫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巫术是原始宗教的一种表现形式。古代称女巫为“巫”,男巫为“覡”,合称“巫覡”。《说文解字》

解释说,巫为“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覡为“能斋肃事神明也”^[1]。在原始宗教的巫仪活动中,人们通过咒语、仪式等手段,以期达到驱鬼逐疫、祈神纳吉的目的。在中国古代的巫术活动或宗教仪式中,戴着面具进行祭祀和驱鬼逐疫的仪式,被称为“雉”“驱雉”或“大雉”。在《周礼·夏官》中有“时雉”“驱疫”的记载,《后汉书·礼仪中》亦载:“先腊一日,大雉,谓之逐疫。”^[2]在雉仪活动中,面具作为巫覡通神的法器,成为人与神“通灵”的重要载体。河北易县北福地史前面具实物的发

现,为我们研究新石器时代早期面具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依据。在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彩陶上发现的面具为研究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面具提供了实证,也为我们深入研究史前陶面具的演进及其与巫雉文化的关系开启了新的途径。

一、北福地遗址面具开启了雉文化的先河

2004年,河北易县北福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距今8000至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制和陶制面具,

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面具实物，填补了中国史前面具实物研究的空白。在遗址中，除少量由薄石制作的面具外，其余皆为陶制面具。其中，完整和可以复原的陶面具共有 12 件。这些陶制面具的制作原料主要利用直腹陶盆的腹部或底部，面具边缘常见切割修整的痕迹^{[3]110}。陶面具表面采用了阴刻、阳刻、浮雕、镂空等雕刻艺术技法，形成了凹凸变化的视觉效果，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北福地发现的这批陶面具，从题材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人面造型，另一类是兽面造型。

（一）人面造型的陶面具

在北福地发现的人面面具中，尺寸较大的面具与真人面部大小相近，边缘设有钻孔，据此可判断这些面具是用于佩戴的实用面具。例如，一件近方形的陶面具，高 13.1 厘米、宽 12.3 厘米^{[4]11}，其四角各有一个用于系绳的穿孔（见图 1）。北福地人面造型陶面具塑造的表情可分为两类。一类较为安详平和，接近生活中常态的人。这类陶面具基本采用浅浮雕手法。面具的上部或下额处常刻有横置的“人”字纹，用以表示头发和胡须。例如：北福地 1 号房址出土的一件陶面具，呈上大下小的梯形造型，人面用两条弧线划分，弧形阴线条形成眼眉，细长的镂孔形成双眼，双眼弯曲上挑。两条弧线形成了额头和鼻部，鼻子下方两个小镂孔象征鼻孔。口部呈方形浮雕凸起，用上下交叉的划线表示上下嘴唇。面具的下巴处刻有“人”字形的横置花纹，可能象征男性的胡须，由此推测该面具表现的是男性形象（见图 2）。

原始巫术常利用神秘感达到魔法效果。北福地的巫者佩戴着表情和善的人面造型面具，正是为了营造这种神秘感。另一方面，北福地的先民们可能认为，戴上人面造型面具后，祖先灵魂会附在面具上，通过巫祭等雩仪活动，获得祖

先神灵的庇佑，这反映了祖先崇拜的文化现象。

还有一类人面造型的陶面具，面貌怪异而狰狞，呈现出夸张的艺术效果。例如，一件呈“风”字形的陶人面具，两眼镂空而斜吊，鼻翼硕大，上牙外露，嘴中吐出下垂的长舌。这种凶恶的人面形象具有震慑的作用（见图 3）。该陶面具四周设有钻孔，可供佩戴。在《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一书中，这件陶面具被描述成“颇似猫科猛兽”^{[3]113}。这类陶面具可能由巫者佩戴。巫者戴上面具或许相信能从中获得神祇或祖先的强大力量，以达到驱邪辟凶的目的。北福地的先民们可能认为，面具的形象越狰狞恐怖，越能令人畏惧，从而巫者具备更强的力量来抵御凶猛禽兽和邪恶入侵。

（二）兽面造型的陶面具

北福地遗址发现的另一类陶面具，呈现猪面和猴面形象。其中较为完整的有两件。一件是猪形面具，上部刻有“人”形的阴线，象征两片硕大的猪耳。双眼镂孔呈菱形，肥圆的鼻子用阴刻弧形表现，并列两个圆形张开的鼻孔，深凹的大嘴中刻有上下相合的线条，象征整齐的牙齿。该面具高 18.6 厘米，宽 11.3 ~ 14.3 厘米^{[3]111-112}，额头上有三个穿孔，脸下方两侧各有一个穿孔，显然是佩戴的实用面具（见图 4）。

猪形面具的出现，可能与原始的畜牧活动有关。在中国，猪是较早被驯化畜养的动物之一，具有较高的繁殖能力。

早在距今 10000 年左右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和距今 9000 年的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都发现了猪的家养情况。在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大汶口文化、半坡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中，猪的形象频繁出现在陶器和玉器上。一方面，畜牧活动需历经艰辛劳作才能获得丰收，猪因此成为农牧丰收的象征，被视为畜牧神（农神）而受到崇拜。另一方面，猪生命力旺盛，有较高的繁殖性，成为繁殖或再生崇拜的对象。在逐渐的演化中，猪的形象被神化，被奉为“家神”。同时，猪是地母复活、重合能力的化身和象征。《山海经·东山经》载：“有兽焉，其状如豚而有牙，其名曰当康，其鸣自叫，见则天下大穰”^{[5]99}，在这里，猪甚至成了避凶化吉、祈福禳灾的神兽。

北福地陶面具上猪形象的出现，表明北福地先民已经把猪作为动物图腾的象征，并将其体现在面具上。佩戴猪形面具的巫者通过巫祭活动，对民众进行劳作和生殖的教化，同时祝愿宗族的繁荣、繁育和丰饶。

北福地遗址发现的另一件猴形陶面具也颇具特色。其猴脸上有一对直径 1.3 厘米的圆框，框内镂孔，形成双眼。脸上有两个歪斜的镂孔鼻孔，面具上扭曲的线条突显出猴子顽皮的神态。猴形面具高 12.3 厘米，宽 8.7 厘米^{[3]115}，足以覆盖人脸。据此，可以推测这也是一件用于佩戴的实用面具（见图 5）。

史前时期，人们在长期的狩猎活动



图 1 人面陶面具，河北省博物院藏 图 2 人面陶面具，河北省博物院藏 图 3 人面陶面具，河北省博物院藏 图 4 猪形陶面具，河北省博物院藏

中，通过模仿一些动物的形象和活动，以达到悄然接近猎物，或期望获得自身不具备而动物具备的较强能力。猴形面具的出现，其原因可能是人类在演进过程中，虽然能够直立行走、上肢获得解放，但另一方面却逐渐丧失了树林间行动的灵活性。戴着猴形面具的人们，或许希望借此拥有猴的灵活性和敏捷性。还有一种可能性是，猴形面具反映了北福地先民对猿猴祖先的图腾崇拜。我国的彝族目前还保留着以猴为图腾的习俗，在“撮泰吉”这一从猿变人的傩戏中，演员们仍会佩戴猴形面具进行表演。

张光直先生在《仰韶文化的巫覡资料》一文中指出“在渔猎时代，我们的祖先跟自然界动物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动物实际上是古代的宗教人物（巫师）通天地时的助手。这些动物纹样很显然是巫师通天地时的助手，是非常重要的工具。”^[6]史前先民们由于无法科学地理解自然现象，认为世间万物皆蕴藏着神秘力量。他们通过佩戴兽面陶面具来模仿动物，以期获得更多的能力，同时也把动物的形象作为图腾或者祖先来崇拜。

同时，北福地遗址出土的这批陶面具与那一时期的原始祭礼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北福地遗址保存着基本完整的史前祭礼场地，发现了用中小型直腹盆、各种磨制石器、绿松石饰，玉器、小石雕、水晶等90多件物品分组堆积的“组合物”遗迹^{[4]7-8}。考古发掘者认为，这是史前祭天地、祈年福的宗教仪式场所

^[7]。因此，北福地陶面具所使用的场合很可能是原始祭祀和祭礼的场地，用于祭祀崇拜。北福地遗址发现的这些陶面具，应该说是最早的傩面具实物，开启了傩文化的先河。

二、半山类型人头形彩陶器盖上面具的发现

1923—1924年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到甘肃广河县（旧称宁定县）东端的洮河西岸进行了详细考察。其在著作《甘肃考古记》中记述：“宁定县属洮河河谷之西侧，见仰韶期之葬地，位于侵蚀平原所成之山顶。此等葬地，多见于八羊沟深谷之北，面向洮河河谷。葬地全部，统名半山地区。”此外，在半山区的东、北和西南面，“均于顶部发现葬地，但似皆以半山为中点也。”^[8]表明半山遗址是整个墓葬区的中心。安特生在半山遗址所获的陶器中，有三件圆雕人头形彩陶器盖，现均收藏于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Östasiatiska Museet）^[9]。

其中一件器盖上的人头形像，呈下部略大的扁圆形，颈下有较为宽大的半弧圆形器盖，器盖边缘呈多角形。器盖前半部分饰有竖条状的折曲纹，后半部分则饰有竖条形的网线纹。从正面观察，人头形塑像的脸部为申字形的平板，鼻梁呈条状隆起，延伸到脑门逐渐减薄。双眼之上有一对凸出的弯曲泥条，上面刻有少许细线纹以表现眉毛。脸部两侧有一对前倾的凸耳，两耳各有一个小穿

孔。眼睛、嘴和鼻孔皆镂空。脸部的大部分纹样以黑彩绘制，嘴下部用黑线描绘出放射形线条，象征胡子。双眼上满绘黑色竖线条纹。鼻子则绘以一道红色，直通脑门。从整体面相和所绘纹样来看，与虎的形象颇有相似之处（见图6）。

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件半山类型彩陶器盖上人头像的侧面发现一些正面难以察觉的特征——平板形的人面与人头呈现若即若离的状态。人面约厚1厘米，边缘刻有细密的锯齿纹。人面的上半部分叠压在人头的正面上，而人面下半部的下巴和胡子部分离开了人头，向外翘出。显然，这是覆盖在人头像上的具有一定厚度的面具。面具左右两侧翘起的耳部各设有一个穿孔，且耳孔下方与人头相接处亦有一个对应的小穿孔。此外，人面下部的正中突出处一个小穿孔与左右双耳的穿孔相呼应。这些穿孔的作用是系绳，以便将面具固定在人头像的正面。因此，可以认为，置于人头像上的这层有厚度的人面，实则为面具（见图7）。

这件戴面具的人头像，其脑顶至脑后绘有黑彩纹样，推测是表现头发。头顶前部有一对竖立的短角。头后部塑有一条长蛇，自头顶后部经后脑、颈部延伸至器盖上部，曲折而下。蛇嘴微张，长蛇形象颇似人脑后的发辫，显然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见图8）。在中国的远古传说中，“神”大多为“人首蛇身”的形象。旧题汉东方朔撰写的《神异经·东南荒经》中也有类似记载：“东南方有人焉，周行天下。身長七丈，腹围如其长。头戴鸡父魁头，朱衣缟带，以赤蛇绕额，尾合于头。不饮不食，朝吞恶鬼三千，暮吞三百。此人以鬼为饭，以露为浆，名曰尺郭，一名食邪。道师云吞邪鬼，一名赤黄父。今世有黄父鬼。”^[9]《山海经·北山经》载：“凡北山之首，自单狐之山



图5 猴形陶面具，河北省博物院藏
图6 带有面具的半山类型人头形彩陶器盖正面，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藏
图7 带有面具的半山类型人头形彩陶器盖侧面，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藏
图8 带有面具的半山类型人头形彩陶器盖后面，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藏

至于隄山，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还有“凡北次二山之首，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题之山，凡十七山，五千六百九十里，其神皆蛇身人面。”^[5161: 65] 对照这件半山类型的人首蛇身的彩陶器盖，可推测这是对人首蛇身形象较早的造型表现。

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所藏的带有面具的半山类型人头形彩陶器盖，并非此类证据中的孤例。在上海金山博物馆，同样收藏有一件半山类型的人头形彩陶罐（见图9）。

这两件半山类型的彩陶，均为人头形带面具样式，器形较为相似。人头面具的面貌如虎似豹，表情威猛而狞厉，这与《山海经·西次三山》中描述的西王母形象极为相似：“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5131] 由此可见，西王母等形象实为兼具人虎特性的神祇。我国彝族至今还保留着以虎为图腾的古老习俗。半山彩陶器盖上所呈现的人头、虎面，或人头、虎面、蛇身的复合形象，亦可视为对复合动物图腾崇拜的一种反映。在雉仪活动中，原始巫师佩戴着图腾面具，装扮成各类图腾动物的形象，或许象征着半人半兽的神灵。

这两件带有面具的半山彩陶，其面具上虎的形象是通过面部绘制的纹样来表现的。面具上的纹样是原始巫术活动的符号图像化表现，象征着观念意识物态化活动的标记。在面具上绘制纹样，反映了半山先民们的文面习俗。文面即在面部绘制图记花纹，其意义在于标识氏族和图腾，具有显著的图腾崇拜意味。半山人头器盖面具上的绘纹，正是对

“虎”形象图腾文面的表现。文面在不同地区呈现不同的样式，分为小文面和大文面两种。

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至今仍保留着文面的习俗。例如，独龙江下游南部地区的妇女采用小文面，仅在上唇和下巴部分绘制直线纹，像男人下垂的胡须。这种文面式样和半山类型人头形彩陶器盖人面上的纹样颇为相似。另一类文面样式，流行于独龙江中上游的北部地区，整个脸部文满纹样。据独龙族描述，这种文面能使鬼魅望而生畏。在面具上绘制纹样，可视作是文面习俗的延伸。在原始祭祀活动时，佩戴绘制纹样的面具比直接在面部涂绘或文面更为便捷。这两件半山类型人头形彩陶器盖所展现的面具绘纹，正是半山先民们佩戴绘有象征“虎”纹样面具的真实写照。

除了面具上绘有纹样外，这两件带面具的半山类型彩陶，颈肩部和器身上也有折线等彩绘纹样。这反映出半山先民在佩戴面具的同时，还会在身上披挂兽皮或羽毛等装饰，以模仿动物的形象。我们在史前岩画中也常见到假扮动物，整体披戴的形象。至今，我国云南纳西族还保留着图腾舞蹈的传统。他们在跳舞时，会佩戴着绘满纹样的面具，头戴羽冠，身披兽皮，并装饰动物尾饰。在祭祀、驱鬼等特定场合，半山的巫师会佩戴“虎”纹面具，以掩盖和置换自己的本来面目，成为神灵的代理人，担负起驱邪避凶的职能。这一方面反映出对“虎”等动物的图腾崇拜，另一方面也是神人通灵的体现。可以说，半山彩陶上的戴面具的人物正是半山时期巫师形象的生动反映。

由此可见，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北福地陶面具，发展至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半山类型时期，面具的主题逐渐从单纯的人形、动物形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逐渐演变为半人半兽的复合形象，成

为神人通灵的象征。半山类型彩陶上的陶面具，构成了北福地陶面具和商代青铜面具之间的中间环节，为研究中国陶面具的演进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三、史前陶面具的功能演变与巫雉文化的关系

史前陶面具的出现与原始的巫雉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千万年巫雉文化的发展长河中，面具一直是原始巫雉活动不可或缺的主要工具，也是原始巫雉文化的基本载体和重要表现形式。

史前陶面具具有与巫雉文化紧密相连的实用功能，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遮掩本人的面目。巫覡们认为，戴上陶面具就可以掩饰自己真实的面目，从而不再是原本的自己。他们视面具为神灵，通过佩戴陶面具塑造出新的形象，戴着陶面具的巫者因此成为神灵的扮演者，或俨然化身为其所扮演的角色。

（二）天人沟通的媒介。史前陶面具是巫覡们与逝去的祖先及神祇进行沟通的重要工具。北福地陶面具上的人形图像，充分说明了陶面具是在天人沟通中的媒介作用。巫覡们在主持雉祭活动时，戴上陶面具后仿佛自身化为神灵，能够通过面具与祖先和神祇进行沟通和交流。

（三）增强自身的能力。北福地出土的兽形陶面具，是原始图腾或祖先崇拜的表现。巫覡们通过佩戴兽形陶面具，期望获得与陶面具所表现的兽类相匹配的强大力量。半山类型带面具的彩陶所呈现的半人半兽形象，也反映了原始先民希望通过陶面具中表现的虎、豹、蛇等猛兽形象，来提升自身的能力。

史前陶面具除了具有上述实用功能外，还具有一定的审美功能。从北福地陶面具到半山类型带面具的彩陶，我们可以看到史前陶面具通过钻孔来满足佩戴需求，同时也十分注重其表面的装饰



图9 带有面具的半山类型人头形彩陶罐正面、侧面、后面，上海金山博物馆藏

性。这些陶面具上通过阴刻、阳刻、浮雕、镂空、捏塑等艺术手法,营造出凹凸感的视觉效果,并且常与彩绘等装饰手法相结合,形成丰富多变的图案。由此可见,雕刻、绘彩等艺术装饰手法极大地丰富了陶面具的表现形式,凸显了陶面具与一般陶器的区别,蕴含着更深厚的原始宗教意识,传达出丰富多彩的巫雉文化内涵,同时也赋予了其更多的审美功能。

史前陶面具主题的演进,实质上是原始巫雉文化现象的反映。新石器时代早期,北福地陶面具上的人形和兽形两大主题,鲜明地反映了祖先崇拜与图腾崇拜的倾向。发展至新石器时代中期,半山类型彩陶面具上人神沟通的体现,标志着半人半兽的神化通灵的演化。在这个漫长的演进过程中,陶面具不仅始终扮演着巫雉活动的重要载体角色,而且其本身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并且不断衍生出更多形象寓意。

进入青铜时代,以青铜为主的金属材料面具逐渐替代了史前的陶面具,开始盛行。商周时期,出土了大量金属面具实物,充分印证了这一转变。在河南安阳殷墟、陕西汉中城固县、北京平谷刘家河、陕西西安老牛坡、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等商代遗址;以及北京房山琉璃河、成都金沙遗址、山西绛县、河南浚县辛村、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等西周遗址,都出土了以青铜为主的金属面具。商周时期,祭礼活动的规范化和礼仪化进程,使得雉祭活动日益兴盛。据《周礼·夏官》记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雉),以索室驱疫。”^[10]那些金属面具延续了史前陶面具的人形、兽形及人兽结合的主题。

四、结语

综上所述,北福地陶面具的发现将

中国面具的起源时间提前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而新发现的半山类型彩陶上的陶面具,则进一步填补了新石器时代早期至青铜时代之间的面具研究资料的空白。这些发现将中国早期面具从起源至滥觞的发展过程连贯起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其意义尤为重大。

中国的巫文化从史前时期一直发展到今天。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虽涌现出许多宗教信仰,但是巫文化从史前萌生至历代的发展,但从未被任何宗教所替代。与欧洲宗教文化的盛行及大规模宗教战争不同,中国的巫文化较贴合民间百姓祈福避凶的心理需求,始终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存在。正是由于中国的巫文化能直接且快速地满足民间百姓的心理需求,中国人很难单一崇拜某一宗教信仰,这也是中国人更多地表现为泛神崇拜的原因。

面具作为巫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功能不断增多,内涵也不断丰富。面具不仅是巫术法器,而且是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神灵体现、宗教象征等的重要载体,以及人们精神寄托的媒介。

注释

- ①其中一件收录于: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图553。另两件收录于: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原始社会至战国雕塑》[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图10、11。

参考文献

- [1]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201-202.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3127.
[3]段宏振.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4]段宏振.河北易县北福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2006(9).
[5]袁珂.山海经校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出版社,1985.

- [6]张光直.仰韶文化的巫覡资料[M]//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36-150.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考古重要发现1949-2009[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50-55.
[8]安特生.甘肃考古记[M].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1925:7.
[9]本社编.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50-51.
[10]杨天宇.周礼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451.
[11]戚志雯.娱神与娱民——天津城隍出巡面具的图像及象征分析[J].创意设计源,2017(5):47-51.
[12]韦思.三星堆青铜器纹饰的审美内涵研究[J].创意设计源,2022(3):43-47.

张卉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